

12

國共合作与北伐戰爭

蔣曉鐘 吳祥安 宣家源 著



国共合作与北伐战争

蒋 晓 钟

吴 祥 安 宣 家 源

《安徽农学院学报》增刊

国共合作与北伐战争

安徽农学院学报增刊专集

安徽农学院学报 编辑部 编

河南省固始县印刷厂

787×1092毫米·32开本 字数：180千字

1986年7月第一版

1986年7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500

书号：安徽省报刊登记证第084号。国内公开发行。

定价：1.60元

序 言

胡 镊 光^①

我是在一九二六年夏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声中参加革命工作的。那时，我是武汉汉阳兵工厂的青年工人。国民革命军占领武汉后，我担任了厂武装纠察队副队长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厂支部委员。北伐军打到武汉附近时，在人民群众中就盛传北伐军作战如何的英勇，纪律如何的严明，待人如何的和气，都把它当作解放的救星。当北伐军进入武汉时，广大群众热烈欢迎的情景至今犹历历在目。但毕竟相距久远，对一些事的印象已逐渐淡薄了。可喜的是，我读了《国共合作与北伐战争》的书稿之后，重新唤起了我对往事的回忆，使我的思绪又回到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年代。

流光如矢，岁月易逝，北伐战争的胜利距离现在已整整六十周年了，今天出版这本《国共合作与北伐战争》，是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很好纪念。

这本书鲜明地贯穿了革命统一战线的思想，强调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重大历史意义。国共合作建立时，孙中山坚决实行联俄、联共、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，并把旧三民主义发展成为具有反帝反封建内容的新三民主义。在中国共产党的

^①胡锡光同志在大革命失败后，即去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，曾任安徽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、省政协副主席等职。

帮助下，国民党进行了改组，增加了新鲜血液，增强了战斗力，使之成为工人、农民、小资产阶级、民族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。这就导致了第一次大革命的兴起和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。

《国共合作与北伐战争》一书总结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历史经验，充分说明了国共两党“合则两利”，革命就胜利发展；“分则两伤”，革命就挫折失败的道理。在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下，建立了黄埔军校和发展了革命武装力量，恢复和发展了工农运动，统一和巩固了广东革命根据地，为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创造了必要的条件。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后，英勇奋战，所向披靡，很快打垮了吴佩孚、孙传芳的主力，解放了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。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：

“中国的革命，自从一九二四年开始，就由国共两党的情况起着决定的作用。由于两党在一定纲领上的合作，发动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。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还未能完成的革命事业，在仅仅两三年之内，获得了巨大的成就，这就是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创立和北伐战争的胜利。这是两党结成了统一战线的结果。”^①但是，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，工农运动的深入开展，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，帝国主义、封建军阀和中国人民的矛盾日益尖锐，革命统一战线内部反对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倾向日益严重，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也日益激烈。帝国主义加紧干涉中国革命，蒋介石集团发动了“四·一二”反革命政变，接着，汪精卫集团又制造了“七·一五”反革命事件，使第一次国共合作完全破裂。而陈独秀等在资产阶级的夺权斗争

^① 《毛泽东选集》合订本，第335页。

中，又采取了妥协退让、以至投降主义的政策，遂使北伐战争夭折，第一次大革命归于失败。

这本书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，根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精神，对一些历史人物进行较为客观、公正的评价。如对蒋介石、汪精卫、陈独秀等在不同历史阶段，给予不同的评价，该肯定的予以肯定，该否定的则予以否定；对谭延闿、何应钦、朱培德、李济深、程潜、李宗仁、唐生智、冯玉祥、张治中等也都根据历史实际情况，予以实事求是的叙述。使人读了有一种新鲜的感觉。

本书搜集、发掘和整理出了一些新的历史资料，吸收了一些新的研究成果，作了一些新的探讨。如对国民党一大的召开，黄埔军校的创立，东征陈炯明的战争，北伐军攻取湘鄂、转战江西、克复东南，以及宁汉对立与合流等都作了详细的叙述，内容丰富充实，基本上反映了历史的全貌。

我认为，这本书是对广大干部进行革命统一战线思想教育，对社会青少年、大专院校学生进行中国革命史教育的较好的学习材料，敬将此书推荐给广大读者。

目 录

序言

第一章 国共合作的形成与北伐战争的准备

一、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

(一) 国共合作前的中国社会与孙中山的北

伐斗争 (1)

(二)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 (17)

二、工农运动的恢复发展和广东根据地的建立

(一) 黄埔军校的创立 (29)

(二) 广东农民运动的兴起 (35)

(三) 平定商团与第一次东征 (40)

(四) 扫灭陈炯明与第二次东征 (49)

(五) 五卅反帝爱国运动 (56)

(六) 沙基惨案与省港罢工 (65)

- (七)国民会议运动与“善后会议” (70)

三、统一战线中争夺领导权的斗争

- (一)反击国民党右派的进攻 (77)
(二)对戴季陶主义的批判 (89)
(三)“三二〇”事件与“整理党务案” (94)
(四)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提出 (100)

第二章 北伐战争的发展

一、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

- (一)国民革命军出师广东 (106)
(二)北伐军的作战计划 (116)
(三)攻取湘鄂 (122)
(四)转战江西 (140)
(五)克复东南 (158)
(六)工农群众支援北伐战争 (168)

二、工农运动的新高潮

- (一)收回汉口、九江英租界 (172)
(二)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 (176)

(三)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村大革命.....	(189)
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第三章 国共合作破裂和北伐战争夭折

一、帝国主义加紧干涉与蒋介石集团叛变革命

(一)万县惨案与南京屠杀.....	(199)
(二)关于迁都之争.....	(204)
(三)陈独秀右倾错误的发展.....	(212)
(四)“四一二”反革命政变.....	(217)
(五)对武汉政府的包围与封锁.....	(225)

二、武汉地区的复杂局面与汪精卫集团的叛变

(一)武汉地区工农运动的继续发展与武汉 政府的二次北伐.....	(228)
(二)夏斗寅叛变与“马日事变”	(239)
(三)郑州会议与徐州会议.....	(247)
(四)“七一五”反革命政变与北伐战争的夭折	(252)

第一章 国共合作的形成与北伐战争的准备

一、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

(一) 国共合作前的中国社会与孙中山的北伐斗争

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 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，推翻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，建立了资产阶级的共和国。但是，辛亥革命后建立起来的革命政权，很快被大军阀头子袁世凯所篡夺，建立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。袁世凯窃取政权后，便向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势力发起猖狂进攻。一九一二年八月间，他下令杀害了在武昌起义中建立过功勋的张振武、方维等；一九一三年三月二十日，又派遣特务在上海暗杀了国民党领导人之一的宋教仁。他在上台后的一年时间里，便血腥屠杀了二千多名革命党人。一九一三年六月，袁世凯下令撤免由国民党人担任的江西、安徽、广东三省都督职，遂导致孙中山发起“二次革命”，但很快被袁世凯的武装力量所镇压，革命党首领孙中山、黄兴^①、蔡元培

^①黄兴（1874—1916），字克强，湖南善化（今长沙）人，为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重要领袖。

等被迫流亡国外，袁世凯更加飞扬跋扈地来恢复封建专制统治。袁世凯强迫国会议员“选举”他为中华民国大总统。他当上大总统以后，立即宣布解散国会，解散国民党，废除“临时约法”，由他的心腹制定了一部袁记的“中华民国约法”，使辛亥革命在形式上取得的一点民主也被他消灭了。

袁世凯权欲熏心，急于想当皇帝。日本帝国主义于一九一五年十一月十八日，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了灭亡中国的“二十一条”。袁世凯为了取得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，实现其复辟帝制的野心，竟表示接受日本提出的亡国条件。袁世凯组织“筹安全”，作为策划帝制的核心机构。他假造民意，组织了各种“公民请愿团”，要求改变国体，拥戴自己当皇帝。袁世凯知道要公开复辟帝制，让历史开倒车，一定会遇到许多阻碍。于是他掀起了一股尊孔逆流，抬出孔子来为其复辟开路。酝酿定孔教为“国教”，并在宪法草案中加以明文规定，又连续发布了一连串鼓吹尊孔读经的命令和条例，通令全国恢复祭孔。他并亲率文武百官，到文庙、天坛祭天祀孔，演出了丑态百出的“尊孔”闹剧。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筹划，于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十二日，袁世凯当上了“中华帝国皇帝”，从一九一六年起，改称为“洪宪”元年。

袁世凯上台以来，无限制地搜刮人民，加重人民的负担。他通令各省“将旧税迅速恢复，新税一一进行”，除属中央的各种“国家税”之外，各省还“可自行筹划”，征收各种名目的“地方税”。“国家税”既“不容稍有短绌”，“地方税”更漫无限制。袁世凯为筹划帝制所挥霍的经费即达六千万元，又在各地摊派“国民代表选举费”、“大典筹备费”等苛捐杂税。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，在推翻了清朝的反动统治之后，此时又陷入了苦难的深渊。

袁世凯死后，黎元洪继任大总统，段祺瑞任国务总理。由于各派军阀之间的矛盾，出现了“府院之争”。后来，黎元洪在美国公使“允为后盾”的情况下，下令将段祺瑞免职。段赴天津，指使各省军阀纷纷宣布脱离北京军阀政府，并在天津设立独立各省军阀总参谋部，要以武力倒黎。别有用心的张勋向黎提出愿进京调停。黎元洪于是邀请张勋进京。段祺瑞也想借张勋之力打倒黎元洪和解散国会，因而也同意由张勋出面调停。张勋在帝国主义和各省军阀的支持下，率领三千辫子兵进入北京，下令解散国会，演出了一场复辟帝制的丑剧。七月一日凌晨，张勋把十二岁的溥仪抬出来宣布复辟，改称这一年为“宣统九年”，通电全国，改挂龙旗。张勋自任所谓首席内阁议政大臣，并兼直隶总督、北洋大臣，大权集于一身。黎元洪逃离总统府，躲入东交民巷日本使馆，电令副总统冯国璋代行总统职权，重新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。

段祺瑞看到驱逐黎元洪、解散国会的目的已经得逞，于是摇身一变，宣布讨伐张勋，组织“讨逆军”，自任“总司令”，各省军阀也随之出兵讨逆。七月十二日，“讨逆军”进入北京，辫子兵被缴械，张勋逃入东交民巷荷兰使馆，溥仪宣布退位。这次复辟丑剧仅上演了十二天，便在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下，迅速破产了。

北洋军阀对内实行封建专制独裁的反动统治，对外实行投靠帝国主义的卖国政策。袁世凯为了镇压人民的反抗，维护其反动统治，从一九一三到一九一四年的两年时间，先后向帝国主义国家借款二十次，共借外债三亿七千万银元，把中国的盐税、海关税、田赋收入、铁路建筑权等几乎全部拍卖给了帝国主义国家。

段祺瑞掌握北洋军阀政府大权之后，为了贯彻其“武力统一”、建立军事独裁政权的方针，不惜出卖国家主权，甘当日本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。段政府以“参战”为名，向日本大量借款。从一九一六年到一九一八年，日本秘密或公开地借给段政府的款项总数在五亿日元以上。段祺瑞通过各项借款，把中国的权益大量出卖给日本。例如：以“铁路借款”、“矿山借款”等名目，将东北的吉长、吉会铁路和所谓的满蒙五路，以及吉林、黑龙江两省的森林、金矿都抵押给日本；以“无线电台借款”、“有线电报借款”、“电话借款”等名目，把我国电讯事业交给日本控制。通过“参战借款”和“军械军火借款”，日本为段祺瑞训练和装备了三个师又四个旅的“参战军”，让日本掌握对参战军的指挥权。段祺瑞还答应“将兵工厂及各省煤铁大矿”归日本控制和垄断，作为借款的抵押。日本还以“顾问”、“教官”等名义，给段祺瑞政府派来大批间谍、特务、军国主义分子，以加强对中国政治、军事、经济等方面控制。一九一八年五月，段政府又与日本签订了《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》和《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》。通过中日军事协定，日本取得了在我国驻兵和军队自由出入我国东北与蒙古的特权。协定签订后的短期内，日本七、八万人开进东北，把侵略势力进一步扩张到东三省北部，迅速代替了沙俄在东三省及蒙古的侵略地位。这说明日本提出的“二十一条”基本上已为段祺瑞所接受。

北洋军阀头子，本身就是大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，是一切反动势力的代表。袁世凯在河南彰德县占有的土地以及在汲县、辉县占有的田亩，共达四万亩左右。徐世昌在辉县有地五千多亩。袁世凯、徐世昌同时又是许多大公司的大股

东。段祺瑞在东北占有大量土地，又是龙烟煤矿和八个机器煤厂的大股东。冯国璋在苏北与张謇合办盐垦公司，占地七十万亩，还拥有钱庄、金矿多处。地方军阀如王占元，在湖北八年，每年收刮一千万元，其家乡山东直达等四县的土地，凡尽为其占有。其他大小军阀、官僚无不如此，他们对中国劳动人民进行了空前残酷的压榨。

军阀官僚不仅占有大量土地，开办许多工矿企业，而且操纵和垄断财政金融，控制着铁路和交通银行的“交通系”官僚，是为北洋军阀政府筹措经费的主要承担者。在北方有靠北洋军阀势力发展起来的金城、盐业、中南、交通四个银行，为北洋军阀经理外债、内债和税收，为军阀混战筹措军费。在南方还有英、美支持下发展起来的上海“江浙财阀”和广州“华南财团”，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支持军阀抢夺地盘和进行混战。

北洋军阀为了进行军阀混战和镇压人民的反抗，拼命增兵扩军。一九一四年全国陆军不过四十五万七千人，到一九一九年初便达到一百三十八万人。一九一〇年，清政府军费开支为一亿零二百万元，北洋军阀统治时期，一九一六年为一亿五千三百万元，一九一八年达二亿零三百万元。这还不包括各地方军阀的实际开支在内。北洋军阀政府的财政支出，军费约占百分之七十。地方军阀的军费，有的竟占该地财政支出的百分之九十。如此庞大的军费支出，除靠滥借外债、增发内债之外，就是无止境地增加捐税。从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一九年，盐税和烟酒税均增三倍，印花税增六倍，田赋增七倍。各地苛捐杂税任意增加，漫无限制。不少地方有所谓田赋预征，一次就预征许多年。中国人民被沉重的赋税负担压得喘不过气来。

军阀连年混战，更直接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。袁世凯称帝时，派兵进入川、湘。这些反动军队，“沿途骚扰，奸淫掳掠，惨无人道”。例如，湘西辰州，人民“相率逃走，兵到数日，全城遂空”。“辰溪县城及附近一带，除营舍及教堂外，不复有人”。“麻阳为所占领，人民迁徙殆尽，……纵横数十里无人烟”。人民流离失所，饿殍遍于原野。大兵所至，“农夫辍耕于野，商贾停业于市，无形之损失，不可以数计”。一九一七年段祺瑞派兵进入湖南，督军傅良佐命令军队“得侵入家宅”，或令居民“退出其家宅”，公开进行烧杀抢掠。一九一八年皖系军阀张敬尧在湖南平江县宣布“三日不封刀”，纵令其反动军队血洗该县城。在军阀混战中，仅湖南醴陵一县，被灾的就有四万七千九百多户，死伤二万三千四百余，其中被杀的达二万一千余人，使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惨重损失。

总之，辛亥革命失败后建立起来的北洋军阀政府，对内实行残酷的封建专制的反动统治，对外实行投靠帝国主义的卖国政策，它们互相勾结，共同压迫剥削中国人民，使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。因此，当时的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，依然是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，封建军阀同人民大众的矛盾，为了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，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反动统治的斗争，便成为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。在这场尖锐复杂的斗争中，中国人民表现出了不屈不挠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，写下了无数可歌可泣的光辉篇章。

孙中山的反袁、“护法”斗争 辛亥革命失败后，中国陷入袁世凯及其继承者大小军阀的反动统治之下，中国人

①《湖南历史资料》，1960年第1期。

民仍然处于深重的苦难之中。孙中山面对这样艰难的局面，他没有后退，而以百折不挠、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，继续为谋求中国的自由平等和寻求救国真理而战斗。

孙中山幼名帝象，稍长取名文，字德明，号日新，一八八六年改号逸仙。一八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诞生于广东省香山（今中山）县翠亨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。孙中山在早年留学海外时，就有了“改良祖国，拯救同群之志”。一八九四年十一月，他在美国檀香山创立了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。一九〇五年七月，孙中山与黄兴、宋教仁等在日本组织中国同盟会。一九一二年秋，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，孙中山被推选为理事长。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二日，孙中山在日本组织了中华革命党，被选为总理。一九一九年十月，他又把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。他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，经历了无数次的挫折和失败，可是他总是随着时代的步伐而不断地奋勇前进。

孙中山的反袁斗争。袁世凯做了临时大总统以后，就进一步投靠帝国主义，日益扩充他的反革命实力，加强反动的官僚机构；又在实现“统一”的幌子下，实行个人独裁，打击革命力量；排挤和镇压革命党人，并向外国银行团大借外债，准备对国民党进行武力打击。这样，袁世凯的反革命阴谋彻底暴露。

当震动全国的“宋案”发生时，孙中山在日本的考察访问已经结束，闻此噩耗，立即于三月二十七日赶回上海，对于袁世凯的所作所为，表示非常愤怒，“始翻然悟彼奸人，非恒情可测”；从这个血的教训中猛醒过来，抛弃了对袁的幻想。孙中山提出采取“先发制人”的手段，在南方各省组织讨袁军，立即兴师北伐。从此，孙中山又踏上了武装讨袁

的战斗历程。

然而，在北洋军阀的武力进攻面前，南方各省国民党人却准备不足，不得不仓促应战。七月十二日，李烈钧在江西湖口宣布独立，举兵讨袁，“二次革命”爆发。孙中山在上海促令南京、上海等地急起响应。于是，由黄兴前往南京，在十五日宣布江苏独立。接着，安徽、上海、广东、福建、湖南、重庆等省市也先后宣布独立。这月中旬，孙中山一再发表宣言和通电，声讨袁世凯杀害宋教仁、违法借款和挑动内战等罪行，要求他引咎辞职，否则，将以过去“反对君主专制之决心”，来推翻他的反动统治。

讨袁战争开始后，南方各省国民党人的军事力量却抵敌不住北洋军的进攻。这时的国民党由于组织涣散，已经失去号召力，不可能广泛地发动和组织群众了。在军事上，各省讨袁军之间也缺乏统一指挥，而帝国主义又积极支持袁世凯，德国还派了军官作顾问，出动军舰助袁作战。在这种不利形势下，独立各省先后被北洋军一一攻陷。孙中山在离沪赴粤途中，航行福州时，得悉广东局势已经逆转，军阀龙济光与驻粤将领合谋依附了袁世凯，再去广东已无希望，只得转赴日本。九月一日，国民党人据守的最后一个据点南京陷落。这样，“二次革命”不到两个月就失败了。

“二次革命”，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，为了从袁世凯手中夺回辛亥革命果实所进行的一次武装斗争。这次反袁战争的失败，标志着辛亥革命的最后失败。

“二次革命”失败后，许多革命党人表示灰心丧气。而孙中山却毫不气馁，对革命前途仍充满胜利信心。鉴于国民党成分复杂，组织涣散，缺乏战斗力，于是孙中山召集流亡东京的部分革命党人，总结经验，检讨得失，决定重新建